奔向2035的新发展格局

■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标志着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吹响了新时代朝着新目标前进的号角。《建议》还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将为经济行稳致远,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建议》是未来5年和15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的奋斗纲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经过100年的英勇奋斗和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我们已经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要加倍努力,精心实施,确保《建议》提出的各项目标实现。

一、新目标既鼓舞人心又实事求是

《建议》提出2035年的远景目标,包括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广泛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宏伟的鼓舞人心的目标,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目标。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提出了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小平同志还说:“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党的十五大、十八大、十九大分别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充分依据的,是经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的。202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5万美元。目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下限为2万美元,未来15年我国人均GDP再翻一番,年均增长4.7%以上,就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未来15年,将是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预计2023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2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2028年,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回到世界第一位置。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我国就稳定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能跨上一个新的大台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为坚实基础。

实现未来15年的目标,关键是“十四五”发展要开好局、起好步。《建议》强调“十四五”时期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新发展格局是实现新目标的重要保证

《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和重要保证。新发展格局新在什么地方:

首先,新发展格局提出了重视经济循环的要求。经济循环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概念,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畅通,是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我国过去曾经为了追赶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阶段,顺利地均衡地进行扩大再生产,是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所以,维护经济良性循环,不仅要搞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还要注重保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其中哪个环节堵塞,形成瓶颈约束,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畅地进行下去,这就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例如分配这个环节,包括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根据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避免个人、地区、行业之间收入的差距不能过大,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必须合理,否则,就会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合理增长,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进而阻碍经济的正常增长。

其次,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实现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并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换升级,释放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主要通过国内需求规模的扩大,拉动经济持续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2020年人均GDP为1.05万美元,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146万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则有更大差距。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只要能够把需求潜力挖掘出来,把蛰伏的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出来,就能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大拉动力。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在人均GDP达到1.9万美元之前,都属于快速增长期。当超过1.9万美元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才明显下降。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我们也应该能够做到。如果在这之前我们的增长速度掉下来了,只能说明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出了问题。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就是要求我们主要从扩大国内需求上寻找发展的动力,支撑未来15年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是要规划好开放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改革42年来,我们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国民经济由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连续12年保持全球出口第一。我国已成为61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产业升级、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回顾对外开放的历程,我们实现了五大转变:对外贸易从加工贸易为主转变为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从最高时的70%以上,已降为25%左右;出口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重达58.4%;资本流动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2020年利用外资1443.7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对外投资逐步接近利用外资额;在产业的开放上,从制造业率先开放,到服务业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格局;在地域开放上,从沿海城市率先开放,扩大到内地城市和沿边城市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有序梯次推进,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前四十几年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是在新形势下对处理好内外经济关系提出的新的战略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解决好国内问题,把自己的事办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们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这些问题影响着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把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可使全党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上。通过解决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有利于使广大人民从经济发展中更多获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我们必须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国内市场,首先满足国内的需要,促进国内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只有国内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才能为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提供强大物质保障,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从人民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意味着要千方百计减少中间产品的占用,缩短流通时间,提高流通效率,扩大最终消费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这就可使广大人民的消费水平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得到更快提高。

三是有利于破解美国政府推行的美中经济脱钩图谋。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打压、封锁、围堵政策,妄图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甚至举全国之力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目的在于剥夺14亿中国人的发展权。对于美国政府的霸道行径,必须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主要通过扩大内需和提高自立自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粉碎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蛮横无理攻击的最有效手段。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六倍多,人均消费额是我国的4倍,只要我们通过改革调整好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广大人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就能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把强劲的增长势头保持下去。从中美贸易结构来看,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高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可替代性高于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可替代性。美国政府对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损失大于收益,最后必将作茧自缚。如果美国政府执迷不悟继续打下去,中国必将奉陪到底。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正是为美中贸易战、科技战长期打下去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

三、经济结构转换才能形成增长新动能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是一个关键,而扩大消费需求又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因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和终点,又是新一轮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消费需求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所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为了满足不同的消费水平的需要,形成了不同的产业结构或经济结构。而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需要的经济结构的转换,就成为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根本举措。回顾改革42年来经济发展的历程,正是由于不断地对现有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进行调整,才为不断扩大内需提供了条件,从而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

在“六五”、“七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围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率先在农村改革,实行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允许发展乡镇企业,对发展轻纺工业采取鼓励政策,仅用十年时间,把消费资料搞上去了,一举结束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商品匮乏、供给短缺问题,带动了广大农民的消费。

“八五”、“九五”时期,围绕满足人民对住行用的需求,振兴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同步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为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我们又用十年时间,把生产资料搞上去了,支撑了九十年代经济的腾飞。

“十五”、“十一五”时期,围绕解决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同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连续五年发行长期建设债券,集中用于能源、交通、通信、水利、大学扩招等建设,以体制转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仅用十年时间,就把高速公路网、高铁网、信息网搞到世界第一,创造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高达两位数的黄金增长期,并为之后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围绕消费升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过度依赖工业拉动、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提高居民消费率,加快第三产业发展,鼓励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消费、第三产业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强。同时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六大改革,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了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总结42年的发展经验,内需的不断扩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而内需的扩大主要来自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经济结构转换、经济结构的转换又主要靠改革来推动。未来5年到15年,我们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就要把改革作为推动发展新格局的关键环节,按照问题导向的要求,通过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转换,包括对城乡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内需与外需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扭曲性结构问题,加大调整优化力度,从而把潜伏于各个领域的发展潜能激发出来,形成强大的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四、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今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宏伟的鼓舞人心的目标,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目标。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提出了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小平同志还说:“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党的十五大、十八大、十九大分别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充分依据的,是经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的。202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5万美元。目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下限为2万美元,未来15年我国人均GDP再翻一番,年均增长4.7%以上,就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达到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未来15年,将是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变化最为明显的时期。预计2023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2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2028年,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回到世界第一位置。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我国就稳定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能跨上一个新的大台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为坚实基础。

实现未来15年的目标,关键是“十四五”发展要开好局、起好步。《建议》强调“十四五”时期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新发展格局是实现新目标的重要保证

《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和重要保证。新发展格局新在什么地方:

首先,新发展格局提出了重视经济循环的要求。经济循环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概念,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畅通,是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我国过去曾经为了追赶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阶段,顺利地均衡地进行扩大再生产,是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所以,维护经济良性循环,不仅要搞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和协调,还要注重保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其中哪个环节堵塞,形成瓶颈约束,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畅地进行下去,这就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例如分配这个环节,包括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根据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避免个人、地区、行业之间收入的差距不能过大,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必须合理,否则,就会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合理增长,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进而阻碍经济的正常增长。

其次,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实现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并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换升级,释放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主要通过国内需求规模的扩大,拉动经济持续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2020年人均GDP为1.05万美元,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146万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则有更大差距。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只要能够把需求潜力挖掘出来,把蛰伏的经济增长潜力释放出来,就能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大拉动力。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在人均GDP达到1.9万美元之前,都属于快速增长期。当超过1.9万美元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才明显下降。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我们也应该能够做到。如果在这之前我们的增长速度掉下来了,只能说明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出了问题。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就是要求我们主要从扩大国内需求上寻找发展的动力,支撑未来15年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是要规划好开放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改革42年来,我们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国民经济由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连续12年保持全球出口第一。我国已成为61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产业升级、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回顾对外开放的历程,我们实现了五大转变:对外贸易从加工贸易为主转变为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从最高时的70%以上,已降为25%左右;出口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重达58.4%;资本流动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2020年利用外资1443.7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对外投资逐步接近利用外资额;在产业的开放上,从制造业率先开放,到服务业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格局;在地域开放上,从沿海城市率先开放,扩大到内地城市和沿边城市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有序梯次推进,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前四十几年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是在新形势下对处理好内外经济关系提出的新的战略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解决好国内问题,把自己的事办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们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这些问题影响着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把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可使全党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上。通过解决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有利于使广大人民从经济发展中更多获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我们必须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国内市场,首先满足国内的需要,促进国内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只有国内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才能为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提供强大物质保障,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从人民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就是要规划好开放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改革42年来,我们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国民经济由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连续12年保持全球出口第一。我国已成为61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产业升级、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回顾对外开放的历程,我们实现了五大转变:对外贸易从加工贸易为主转变为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从最高时的70%以上,已降为25%左右;出口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重达58.4%;资本流动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2020年利用外资1443.7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对外投资逐步接近利用外资额;在产业的开放上,从制造业率先开放,到服务业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格局;在地域开放上,从沿海城市率先开放,扩大到内地城市和沿边城市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有序梯次推进,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前四十几年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是在新形势下对处理好内外经济关系提出的新的战略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解决好国内问题,把自己的事办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们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这些问题影响着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把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可使全党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上。通过解决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有利于使广大人民从经济发展中更多获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我们必须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国内市场,首先满足国内的需要,促进国内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只有国内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才能为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提供强大物质保障,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从人民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

(紧转A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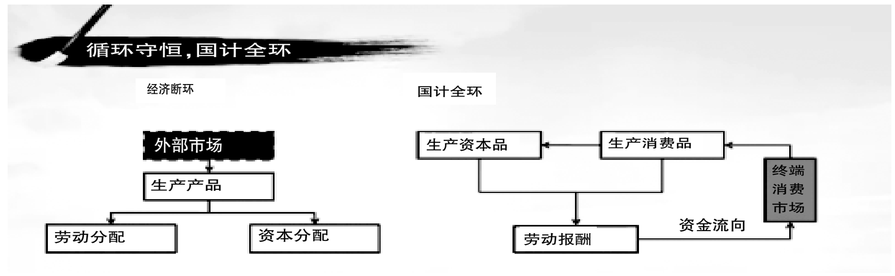
双循环经济理论是大国特色经济理论

■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程碧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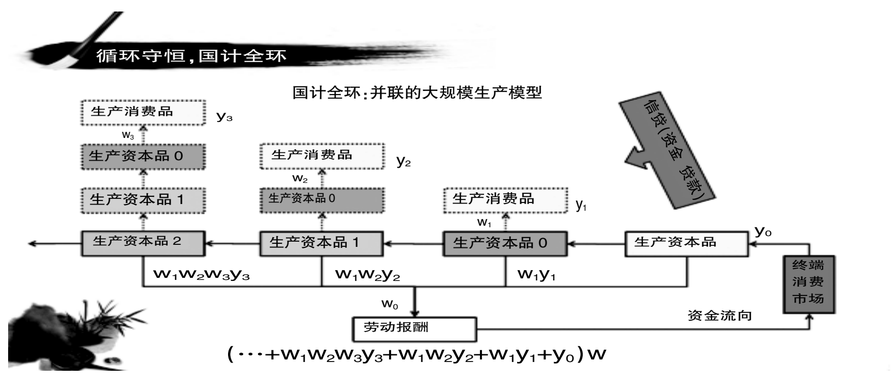
本文主要介绍笔者在《循环守恒、国计全环》部分研究成果。2006年笔者出版了《国计学》第一版,在中国传统经济理论基础上首次建立经济双循环模型,随后在2007年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均衡增长模型及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第一次将此双循环模型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准确研判中国之后十多年的经济发展。2010年出版《国计学》修订版,2015年出版《国计学 国计民生的系统科学》,将双循环建模不断完善,见图1。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鲁滨逊经济的小生产者模型基础上,其体现欧洲小国经济面对无限国际市场的特点,没有形成内循环经济,亦无法形成内外共同作用的循环经济,所以根本谈不上循环体系。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有内循环以及受内循环影响的外循环经济体系。

西方经济学所谓理性预期的“准确预测能力”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的微观本质。当把整个经济视为鲁滨逊个体经济时,所建立的经济学模型是经济增长模型,也就是个体的长期投资回报模型。此模型的数学范式,是个体根据假设的生产函数和消费效用贴现率计算不同投资率下未来消费流的效用贴现最大值。通常还对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做数学上的限定,以使此模型可解且解的数量有限,甚至使解的数量唯一。由于最大值可解,故此数学模型是负反馈系统。负反馈是指当主体的选择无论从哪个方向偏离最优解,函数值都将减少。因此市场中任何主体都没有偏离最优解的意愿。又因解的数量有限甚至唯一,故此数学模型是简单系统,市场中所有人的解都相同,能形成一致预期。当市场中所有人都面临类似“1+3=?”这样的问题时,显然整个市场能形成一致预期:“4”。而这个预期与模型解必定相同。这就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理性预期推导的全部逻辑。它的本质是说,当把一道解唯一的数学题放到市场中,市场中所有人都可以计算出这个正确的解,由此形成理性预期。然而负反馈的简单系统在人类经济中极为个别,人类经济总本说是正负反馈交织的复杂系统。



●图1 西方经济学与国计学架构对比



●图2 国计全环:并联的大规模生产模型

但是理性预期不适于复杂系统。宏观经济是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基本标志即解的数量趋于无穷,或至少相对人类计算能力来说趋于无穷,理性预期就难以求解。理性预期在经济正反馈系统中也无法存在。正反馈是指人们的行为朝某方向偏离时,所获收益更大。而此收益将反馈回经济系统,使行为更加朝此方向偏离。负反馈系统中对系统的随机扰动会被负反馈抑耗,从而降低噪声,提高预测准确度,因此具有稳定概率分布,可形成理性预期的期望值。正反馈系统中对系统的随机扰动可能被正反馈放大,形成整个系统的震荡,不具有稳定概率分布,无法形成理性预期的期望值。复杂性和正反馈性是人类经济社会的一般特点:负反馈的简单系统只有在家庭理财等极个别领域出现。理性预期不存在于复杂系统和正反馈系统,是纯粹逻辑推导的结论,亦表示为国计运行模型的数学形式。

我国自古就有国计之学,周朝称之为“官计”,《周礼.冯人》“以八法治官府……八曰官计,以弊邦治”。西周设有比较完整的国计组织。司会为官计之长,凡财务会计必揽,负责组织官计工作;司会所属有司书、职内、职岁与职币四大官员,分管会计与出纳事务;此外,还设了小宰、小司寇,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的国计报告制度。管仲很注意国计原理的总结和运用,在当时推行了国家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护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以后历朝历代均设有官计机构,配备有专职官计官吏,汉代及以后将“官计”改称“国计”并出现了复式记账法。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模型只是单生产模型,无法体现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构关系,而宏观经济的波动往往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国计学则建立并行的产业链社会化大生产模型,建立了空间横向和时间纵向上的纵横生产函数,整个循环系统均围绕此生产结构而建立。这为中国经济学、中国金融学的建模打下了坚实基础。

宏观经济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化的纵横生产。纵向生产指社会产品形成产品链。任何产品都由更初级产品生产而来,一直到原材料采集。横向生产指任何时刻社会都在同时生产从初级产品到最终消费品的整个产品链,可买到产品链任何环节的产品。宏观经济时空纵横联系的整体属性使其区别于简单的多个体经济。国计学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特征、货币分析与实物分析关系的特征、经济学与金融学关系的特征,乃至组织管理整体与局部关系特征的剖析,都属于基础研究范畴。国计学构建了社会化纵横生产体系下产品流量表、央行和金融系统流量表、国民资产负债表、国民收支平衡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收支头寸表及企业财务报表,既描述了当前的经济结构,又包含未来的结构变化,覆盖了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内容,见图2。

国计学把握复杂系统的出路是从宏观到微观建立起经济流量勾检分析。宏观经济各流量的边界条件、勾检条件都具有国计簿意义上的确定性,这是经济系统的硬性约束,与市场自发行为无关。通过此约束可获诸宏观要素间的方程联动关系,构造宏观流量分析模型,建立基于物理定律而不是心理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来确定性地描述经济社会,使其成为科学。

通过宏观经济流量约束分析,可获经济体的约束边界,但这并非全部。宏观诸流量的边界等约束条件犹如市场中的一条条无形管道。我们知道市场必须要在这些管道中流动,但各市场主体却可自主决定流向哪条管道及其流动速度。此自主性来自人类智力博弈,具有无穷创造性。也因此经济体成为正负反馈交织的复杂系统,常具有无穷多解而不存在理性预期。

依据宏观经济流量管道建立宏观经济约束模型,让真实人扮演市场角色,在模型约束下完成市场行为。各扮演者发挥自主性来争取更多利益,就构成宏观经济推演系统。解的无穷性使每次推演都有不同棋谱。犹如围棋学习一样,棋谱数量远限并不妨碍人们通过大量棋谱学习来提高棋艺、分析市场。棋谱学习将是未来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方法。

国计学相关经济金融理论在政府、交易所、大企业、大机构等市场主体分析经济上更有优势。这些主体有条件掌握较多的市场信息。市场信息越充分,经济方程中未知数越少,方程求解越精确,反之方程求解越不精确。本文无不谈定量分析判断,单从定性的角度讲,根据国计学有以下结论:

消费与资本的共轭原理。由结构方程式可知消费与资本存在共轭关系。未来消费时间序列及技术水平决定当期资本品总量及结构(开放经济下包括进出口结构)。封闭经济下当期资本品增多对应未来某时期的消费品增多;反之未来某时期的消费品增多也对应当期资本品增多。

消费与资本的正反馈原理。由消费方程式租资本方程式可知消费与资本存在正反馈。若消费方程式失衡,表现为消费购买力不足,资本方程式的资本收入将下跌,资本品购买减少,投资压低,引起消费方程式进一步失衡的正反馈。结构方程式中消费和资本均萎缩,收益方程式的增长率下降。反之则会引起经济泡沫的正反馈。

一般而言,资本总是试图压低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工资成本的压低使消费方程式失去平衡,引起消费方程式和资本方程式的彼此正反馈,并直接使结构方程式和收益方程式萎缩。

扩张财政政策压缩消费结构的原理。消费不足时,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投资,短期内可扩张工资平衡消费方程式,却使结构方程式中当期消费品比例下降,未来消费品比例上升。若固守此收入分配比例,将在未来产生更严重失衡。

货币流与实物流正反馈的原理。消费方程式和资本方程式均含货币信贷。若大量货币储蓄,周期存贷差便产生,本期限内信贷冲销不能完成,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因储蓄而等价于被冻结,消费方程式和资本方程式均失衡,产生消费与资本失衡的正反馈,使结构方程式和收益方程式萎缩。经济紧缩使抵押物价值下跌和赢利前景看涨,信贷加剧紧缩,货币储蓄继续增加,周期存贷差继续扩大,货币危机加剧。反之会有信贷与消费资本方程式、结构方程式及收益方程式扩张的正反馈。

收益方程式受经济物理技术条件限制。当实物资源充分就业,增长便达极限。若信贷继续扩张,货币便转化为膨胀物价。此时只要消费方程式、资本方程式、结构方程式、收益方程式和周期存贷差任一出现相反方向失衡,逆向正反馈发生,泡沫就易破灭。物价急剧膨胀时,人们将囤积物资、增加投资、压低消费、降低结构方程式中消费比例值。消费比例的变动将在未来引起消费方程式衰退,泡沫破灭。

经济失衡下的经常账户平衡。消费方程式中,在经常账户平衡时,此时若消费内需不足,资本必有进口,反之同理可得。故若国际市场无限大,通过外贸总可获经常账户平衡。消费内需不足时,消费方程式中为本国使用的消费品将减少,资本方程式中本国使用的资本品中有相等价值的部分来自外国生产,严重时本国消费水平降低、本国生产为外资替代的现象将出现,且本国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受控于国际市场,故衡量对外依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外贸依存度[(当期进口+出口)/GDP]。而非净出口,有人认为应取消外贸依存度指标,改之以净出口指标,此看法并不谨慎。

若国际市场有限,消费和资本方程式的失衡还将影响汇率等系列因素。如消费需求不足而国际市场有限,间接汇率将被迫下降,即本币贬值,才可满足消费平衡。本币贬值不利资本品进口,故此种经济将于销售未端降低收入,于生产端提高成本。

影子汇率问题。影子汇率指央行外汇储备为零时,允许市场自由浮动的市场汇率。消费、资本及外贸方程式含外汇债权债务关系。净债务,但外资持有的债权凭证多是本币,故若净债务过大,影子间接汇率将低于现行汇率,以降低风险,本币有贬值趋向,反之有升值趋向。净债务也应区分对冲周期。即使债权总量高于债务,若某周期内可动用债权数量低于到期债务,本币受金融组击而贬值的威胁仍然存在。

西方经济学中投资品和消费品同质可相互转化。投资多,消费就少;消费多,投资就少。现实中虽然财务上与物质形态上的投资品和消费品有所交叉,但商品的物理形态会决定商品的主要用途。例如,生产出来的电视机主要供人消费,即使其作为投资品也仅限于企业采购来做培训等用途,除此之外,不能把它又拿来生产其他产品——除非把它砸烂作为废品回收。此时消费和投资就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电视机并不会导致电视机的投资减少,相反不消费电视机反会导致电视机的投资减少。

不管消费率和投资率是多少,合理的原则是,若最终产品已经生产出来而且其物理性质决定其很难转化为其他投资,那么这些最终产品就应当被消费。由此投资率和消费率就转化为另一问题:生产消费品的比例。若要提高投资率就应少生产消费品,多生产资本品,反之可推。

一些理论一方面鼓吹高投资率,另一方面鼓吹中国不直发展高科技产业而应发展租放型回收期短的产业。从微观上看,这两个主张完全可以统一:一个企业投资回收期短、高投资率,完全可以发展得很快。但落实到宏观经济领域则是矛盾的。回收期短、产业链末端的生产常是消费品生产,而离终端产品越远的生产就是消费品产出滞后、资本品产出越多的生产。排除掉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开采业,产业链上游的生产主要是基础研究、高精尖科研、重、业等间收期长的生产。因此,国家要追求高投资率的高速增长,就必然应发展回收期长的产业;若发展短期见效的产业,短期内就会有大量消费品产生。大量生产消费品的同时却鼓吹扩大投资率,降低消费率,那就会出问题。

又或者有学者提出,即使发展短平快项目,只要大量终端产品出口换网投资品,就可以高速增长、高投资率与短平快项目兼顾。然而,由于大量终端产品用于tH 口而不是同内消费,人民生活水平并不会比发展长周期产业更好,不会因为同收期短而获益。相反,却有大量人力和时间被花费在低层次的重复生产上。

西方经济学缺乏消费的一席之地。虽然西方经济学的公式都以消费效用作为优化目标,但消费本身并不反作用于生产函数。消费越少投资越多,西方经济学公式中财富增长就越快——虽此时消费效用贴现不一定最优。但实策者包括学者们谁又真把效用贴现这个虚无的东西当一回事呢——财富增长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消费除了给人快感外不过是在损耗财富,因此都很不得把消费压到最小。

然而,在国计学中消费并不是纯粹的财富损耗,相反消费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合理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可培养出高素质人才,这才是真正的财富